

中国禅宗美学智慧读本

禅艺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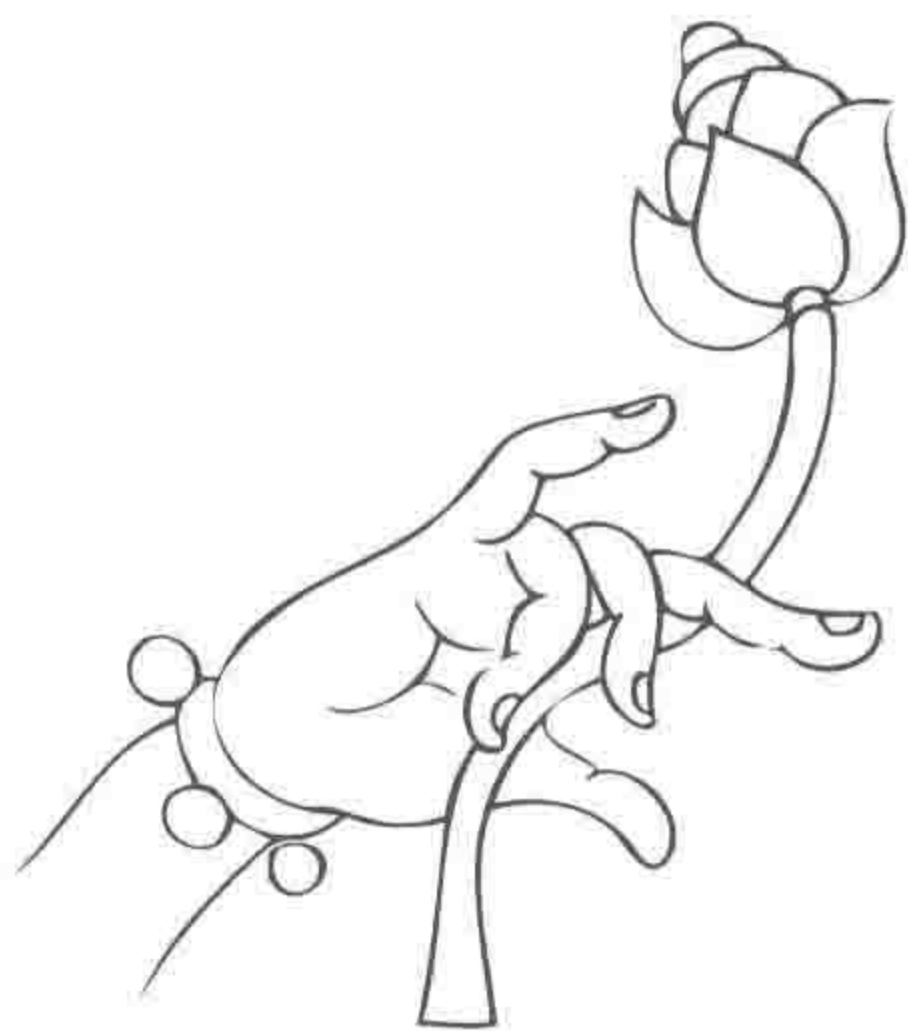
纯道 编著

禅与茶，是两者，又是一体；
禅茶，是一体，又是两者。
禅中有茶，茶中有禅，禅茶一味；
道是：禅是一碗茶！



禅艺文化丛书

 文匯出版社



中国禅宗美学智慧读本

禅艺茶道

纯道 编著

 文匯出版社



序 言

禅与茶，是两者，又是一体；
禅茶，是一体，又是两者。
禅中有茶，茶中有禅，禅茶一味；
道是：禅是一碗茶！

一、孰知茶道全尔真

中唐时期的皎然在一首《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的诗中写道：

孰知茶道全尔真，
唯有丹丘得如此。

根据可查资料，这是最早出现“茶道”一词的诗文，其意是说：谁能知道茶道的全部真谛？只有仙人丹丘子才能够做到！

曾几何时，一说起“茶道”就让人联想到“日本茶道”。为什么不是“中国茶道”呢？或许是如今的中国人过于低调，抑或是如今的中国人过于自卑，大家向来以“茶艺”代替“茶道”，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中国茶艺”“韩国茶礼”与“日本茶道”的约定俗成。

一种文化现象，因其深入的程度不同和达到的境界差异，而可以

冠以不同的称谓，一曰“技”、二曰“艺”、三曰“道”。道高于艺，又覆盖艺，艺却不能代替道，更不能超越道；同样，艺高于技，又覆盖技，技却不能代替艺，更不能超越艺。技与道，则更是南辕北辙，有着天壤之别。

技，是一种巧。在茶事活动中，技是一种被分割了的熟练技巧，因为机械地重复而可以达到一种熟能生巧的程度，正如北宋欧阳修所著的一则写事明理的寓言故事《卖油翁》，所记录的陈尧咨射箭和卖油翁酌油的事，与庄子所讲的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的故事如出一辙。技是依靠重复的数量就能达到的巧，有人擅长煮水，有人熟练泡茶，有人稔知筌茶，虽然得来不易，若浑然不知茶之真谛，此般技巧、技术、技能，就只能始终处于学徒境界。

艺，是一种美。在茶事活动中，艺是一种获得了美学滋养的实用艺术，它让人看起来更有素养、更为优雅、更有气派，但它同样可能沦为一种很文艺的表演程式，重外表而轻实质，在装腔作势中获得一些无法持久的敷衍赞美与自我安慰。如果一个茶人仅仅满足于茶艺表演，那么就无法进入艺术境地，更无法领略真正的茶道之美。当一种文化现象与艺相连时，它可以从技艺变身为一种不断创新的艺术，但也可能止步于艺人境界。

道，是一种德。在茶事活动中，道是一种连接生命内在能量的精神力量，通过类似宗教信仰般的虔诚，把自己的身心全部投注其中，当我之本性与茶之本质相契相合时，才能获得茶道的真谛。茶有三德，或茶有十德，都是将茶与修心养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为茶技，不图茶艺，唯求茶德。中国禅宗主张淡泊无为，以“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的清静本心，去了悟“我心即佛”的般若真谛，从而达到“梵我一如”的禅者境界。



因此，茶道非一国之人所有，乃达到境界者共有。中国是茶道的肇基地，当由中国人诠释与沿用最宜。

二、一盏清茗酬知音

生活在十二世纪的日本荣西禅师，写了一本《吃茶养生记》而被尊为“日本茶祖”，在这本书中，荣西禅师只提及“茶者”“茶德”“吃茶”“采茶”等词，还未出现“茶道”两字。到了十五世纪，村田珠光首次将禅引入茶的精神世界，因此被奉为日本茶道鼻祖。研读他留下的文字，却也并没有见到“茶道”两字，而最为接近的提法则出自他写给大弟子的一封信，名曰《心之文》，第一句即写道：

此道最应忌讳的就是傲慢与贪婪、嫉妒高明者、蔑视初学者之心。

此道，由此被认定为“茶道”，赋予茶以深邃的思想内涵。到了十六世纪，千利休成为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在村田珠光的“闲寂茶”和武野绍鸥的“数奇屋”基础上，为日本茶道确立了精神定位和形式定位。

可见，生成于十六世纪的日本茶道，比之皎然提出的“孰知茶道全尔真”的八世纪，晚了八百年左右。“茶道”发轫于中国，中兴于日本，没有理由说“茶道”只属于日本，而不能说属于中国。以中国茶艺、韩国茶礼、日本茶道来区分三国的茶文化内涵，是一种自甘贬低的默契，其实大可不必。若真要区分三国茶文化特点，完全可以中国茶道、韩国茶道与日本茶道来区分。

中国、韩国、日本三国的茶道发展与演化，共同促进了东方茶文

化在精神领域中的提升。在融合与分化中，更多时候难以区分出一国一地的差异，正如冈仓天心写作《茶之书》用意所在，他想提倡的是“现在正是东方的精神观念深入西方的时候”，《茶之书》是向西方世界谱写了一曲意味深远的以“茶道”为主题的“高山流水”。在冈仓天心笔下，茶道意味着美学成为一种生活实践，人们的行为举止都可以依照茶道的礼节来调整。

基于这样的认识，首先在日本获得了共识，人们愿意用茶道的礼节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从皇室，到武士，再到如今的政客、文人与市民，都十分乐意去接受茶道的浸淫。因此，在日本的茶道流派层出不穷，精彩纷呈，人们通过修禅问道，把茶道带到了至善至美的精神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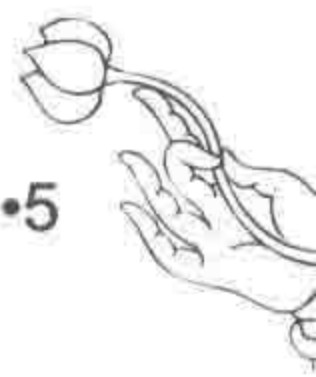
中国茶道的发展伴随着时局的纷纷扰扰，此起彼伏，始终没能形成茶道的流派氛围，因而难以建立起需要时间积淀的传承与创新，只是在针对不同人群的茶道特质方面出现了一些别具特色的茶道内涵与形式。人们把中国茶道按照人群特点分为了：宫廷茶道、雅士茶道、世俗茶道与禅门禅道，这不能说是四种不同的茶道流派，只能代表着不同人群对茶道某些方面的形式与内容的偏爱。

半壁山房待明月，一盏清茗酬知音。独坐山居寒舍，等待明月升起，朋友寻路而来，一壶清茶，君子之交淡如水，便是如此。作为茶人，最应知道的是自己需要什么样的茶道，谁才是自己的知音？

三、君不可一日无茶

宫廷茶道并非中国茶道主流，但因文献记载较多而更易留下史料，人们也可通过对宫廷茶道的了解，获得当时茶道发展的水准。

英国《独立报》报道，中国皇室成员好茶，起码在2160年前。



考古发现，随公元前二世纪中期汉景帝埋葬的一些叶子实际上是茶叶，汉景帝卒于公元前141年，这些茶叶因此可追溯至那一年左右。发现的茶叶看起来具有顶级品质，完全由茶芽制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皇室和上层人物信仰佛教、支持佛教，把敬茶作为礼敬佛祖的最高礼仪，于是宫廷崇尚饮茶。贡茶是中国古代一种向宫廷进贡的方式，初始由各产茶地作为土特产品进贡皇朝，属土贡性质；唐朝开始贡茶有了规范发展，在重要的名茶产区设有贡茶院，由官府督造贡茶，细求精制，所贡之茶都是当时最上乘的名茶。到后来，贡茶不再成为礼敬佛祖的用品，而成了皇家专享特权。

法门寺出土的茶具制成于咸通九年至十二年的晚唐，为僖宗皇帝御用真品，这套茶具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最完善、最精致的茶具文物，大唐皇帝在六迎佛骨时将这套宫廷茶具奉献给法门寺。大唐宫廷茶具证明了唐代佛门禅茶非常兴旺，透过这些由金、银、瓷、琉等材质所烘托出来的茶具，大唐宫廷饮茶风采尽收眼底。

有了香茗与茶具，宫廷在各类活动中就开始编入供茶品茗环节，唐以后历代朝廷也沿袭供茶礼制。在宋代宫廷中，春秋大宴皆有茶仪。清宫礼仪活动也多与茶相关，在万寿礼、大燕之礼、大婚之礼、命将之礼、太和殿筵宴、保和殿殿试等大型活动中都有茶礼一项。

皇帝和臣子们文会时，也令宫女随时以茶汤伺候，君臣则吟诗作对、切磋学问，一同品茶，使得文会更加尽兴。皇帝还会赐茶给文官饮用，有时也会将贡茶赏赐给臣下，唯有在这种特别时候，非皇室贵族身份的人才有机缘品赏到高档的贡茶。宋朝时形成的宫廷茶宴茶会影响周边国家，高丽时代的朝鲜半岛，宫廷茶礼与宋朝宫廷茶会有诸多相通之处。

皇家喜爱茶事，并与僧人频频往来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相传，

当乾隆皇帝八十五岁要退位时，有大臣谄媚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啊。”乾隆皇帝则回答说：“君不可一日无茶啊。”他曾撰写过几百首茶诗，六次南巡，游历杭州，踏赏龙井，去惠山寺参拜时还让皇家造办处仿制惠山竹茶炉，这件竹茶炉至今还完好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內。

日本茶圣千利休曾作为茶头，帮助丰臣秀吉为天皇点茶，所用的茶具专门定做，崭新呈现，也包括珍贵的唐物，可谓极尽奢华，这其实与千利休倡导的“侘寂”美学格格不入。后来，丰臣秀吉建了一座黄金茶室，这恐怕只有像丰臣秀吉这样出身卑微，又晋升为“土豪”的人才会想得出来。可见，宫廷茶道要的是一种排场与奢华，在多数情况下，与茶汤好坏无关。

四、一日不见心生尘

雅士茶道在中国茶道中别具一格，为文人墨客所喜爱，因而在吟文赋诗中加注了太多的个人情感与审美情趣。雅士茶道最重环境的营造与气氛的铺垫，对主客两方的修为也特别在意，人们在共赏中希望加入一些表演展示的内容，从而开创了具有诸多地方特色与个人色彩的茶艺之风。

“琴棋书画诗酒茶”，在文人雅士心目中，茶通六艺，茶可使六艺添趣增色。中国文人雅士自古喜爱雅趣，在元人张雨散曲《水仙子》中，把挂画、插花、焚香与煎茶一并收归其中：

归来重整旧生涯，潇洒柴桑处士家。

草庵儿不用高和大，会清标岂在繁华。

纸糊窗，柏木榻。



挂一幅单条画，供一枝得意花。

自烧香童子煎茶。

最末三句“挂一幅单条画，供一枝得意花。自烧香童子煎茶”，活脱脱地再现了中国文人雅士的精神诉求。如今，这四项被日本人以“雅道”一词囊括其中，又活生生地变成了具有日本文化特质的挂画、花道、香道与茶道。

这雅道一词，如今的中国人用得少，日本人却常挂嘴边，殊不知“雅道”的首创者同为中国人。隋朝江总《庄周画颂》中有写：“丹青可久，雅道斯存。”唐朝诗人卢照邻在《三月曲水宴得尊字》中记有：“高情邈不嗣，雅道今复存。”唐朝郑谷《寄题诗僧秀公》又诗：“近来雅道相亲少，唯仰吾师所得深。”元朝辛文房则有《序》：“唐几三百年，鼎钟挟雅道，中间大体三变。”茶道作为雅道之一，自古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如果仅有茶艺而没有茶道，又何以有“雅道”一词，认为中国只有茶艺，没有茶道，岂不是也不能有“雅道”，而只能有“雅艺”一词。事实上，不论是《辞海》，还是“百度百科”，均未有“雅艺”的词条。

明代沈周在《书芥茶别论后》中说：“自古名山，留以待羁人迁客，而茶以资高士，盖造物有深意。”饮茶对于文人雅士来说，是一种优游光阴、寄闲托意的“雅举”，是士大夫文化中的一种清尚。日本的书院茶亦有雅士茶道的味道，主要盛行于以将军为首的武士之家，也可以称为殿中茶会。

许多文人一日不可无茶，如白居易是“尽日一餐茶两碗”，欧阳修是“所好未衰惟饮茶”，苏东坡是“枯肠未易禁三碗”，唐伯虎则是“买得青山只种茶”。唐代卢仝所言“平生茶炉为故人，一日不见心生尘”，

更是把文人嗜茶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

明代陆绍珩在《醉古堂剑扫》卷六《景》小序中写道：

结庐松竹之间，闲云封户。

徙倚青林之下，花瓣沾衣，芳草盈阶。

茶烟几缕，春光满眼，黄鸟一声。

此时可以诗，可以画，而正恐诗不尽言，画不尽意，而高人韵士，能以片言数语尽之者，则谓之诗可，谓之画可，谓高人韵士之诗画亦无不可。

写出了文人雅道的所喜所爱，在恬静平和的环境中，诗画连连，茶絮片片，一派美好人生的景象。

五、有好事者开茶馆

世俗茶道也就是百姓茶道，没有太多讲究，人们可以端起碗吃茶，放下碗聊天；可以饭前当饮料，饭后来漱口。

西汉成帝时王褒著有《僮约》一书，其中记载有“烹茶尽具”及“武阳买茶”两句，“烹茶尽具”表明在成都一带当时不仅已经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用的饮茶用具；“武阳买茶”则表明茶叶已经转身为一种常见商品，在武阳一带出现了茶叶市场，这是世俗茶道在文字中的最早记载。

宋人刘松年所画《茗园赌市图》，描绘市井小民斗茶的情形，斗茶者携有全套器具，一边品尝一边自豪地炫耀自己的茶品。茶贩有注水点茶的，有提壶的，有举茶杯品茶的。前边有一挑茶担卖茶小贩，停



肩观看，还有一妇人一手拎壶另一手偕小孩，边走边看斗茶。此画中有男人、女人、老人、壮年、儿童，表情各异，眼光集于茶贩们的“斗茶”，把宋代街头民间斗茶的情景淋漓尽致地描绘在世人面前。

明代《家常礼节》中提倡奉茶明礼敬尊长，则影响到了民间茶礼，深入百姓之间。明朝出现私家园林，有的设有私家茶寮；茶馆一词也开始出现，如张岱所著《陶庵梦忆·露兄》写道：“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日本出现过的云脚茶会与淋汗茶会也属于庶民茶，即是世俗茶道。

茶馆是中国世俗茶道的重要载体，也是人们休息、消遣和交际的场所。茶馆的雏形是茶摊，根据古代典籍，最早的茶馆形态则出现在唐朝开元年间（713-741），称为茗铺。

以往，在中国江南的小镇上，通常都开设有四家最基本的店：茶馆、肉店、豆腐店和综合商店，没有这四店不成镇，有了四店来赶集，因为它们可以满足周边人最基本的生活所需，真可谓“没有茶馆不成镇”。

成都素有“茶馆冠天下”之说，遍布大街小巷的茶馆成为成都一景。茶馆中，人们可看川剧、可听清音、可遛鸟、可打盹儿或者看看闲书、几人凑在一块儿摆龙门阵，还有掏耳朵的、擦皮鞋的、算命看相者游走其间，人人逍遥自在，个个自得其乐，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感受到四川茶馆的世俗风情。

老舍先生创作的《茶馆》，则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政府成立前夕三个时代的社会风云变化，通过一个世俗茶馆揭示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光怪陆离与芸芸众生。剧本中出场的人物近五十人，除茶馆老板之外，有吃皇粮的旗人、办实业的资本家、清宫里的太监、信奉洋教的教士、穷困潦倒的农民，以及特务、打手、警察、流氓、相士等，人物众多但性格鲜明，能够“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就

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

世俗茶道没有统一的规则与要求，通常都融入了各地的民情习俗，比较注重技能层面的展示，对熟悉掌握茶具知识者有所偏爱，而对规范茶客的行为比较抵触。在世俗茶道中，有一批人对于茶道的审美要求与精神诉求持对立情绪，认为无须用太多无形的东西束缚茶人的自由行为。

六、自古高僧爱斗茶

禅门茶道是起源于佛教寺院的一种茶道，茶被赋予了更多精神内涵。自古以来的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法门之一。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建在山林中的寺院大多有自己的茶园；同时，在古代也只有寺院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和茶文化。

关于茶的传说历来形形色色，对于禅与茶的结合，在佛门中就有这样的传说：认为茶叶的起源与达摩祖师的修行过程有关。相传达摩祖师在少林寺面壁参禅，九年不睡，中间困顿，为防瞌睡，揭眼皮堕地而成茶树，达摩祖师偶食其叶后，便困意全无，精神舒畅。这当然是十分有趣的故事，却无法证明真有其事，无非想说明禅与茶的结合是有渊源和缘起的。不过，后来的禅师确实在打坐时常用茶汤驱赶睡魔，养助清思。

佛教禅寺大多建在高山丛林中，得天独厚，云里雾里，极宜茶树生长。环绕在寺院周围的茶园天然与寺院相伴相生，因此早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一说。郑板桥有一副对联写得很妙：“从来名士能萍水，自古高僧爱斗茶。”寺院茶事活动为茶道的精神体系与表现形式提供了基础与方向。



唐代仰山慧寂禅师有一首无题诗：

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

酤茶三两碗，意在锄头边。

刻画了一个不持戒、不坐禅，却整天饮茶、做农活的僧人，体现出了学禅不拘泥于形式，而在于领会禅意的思想。饮茶是僧人生活情趣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变文集》卷三载唐人《茶酒论》说：“明（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五灯会元》卷九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慧寂说自己是“酤茶三两碗”，显然也能见出这种“和尚家风”。

在佛教的带动下，公元十二世纪时，朝鲜半岛上的著名寺院都提倡饮茶之风，僧侣们更频繁地饮茶，不断在各种礼佛活动中用茶，在日常修行生活中亦经常饮茶。真觉国师欲拜普照国师为师，刚到山下时已被普照觉察，随口吟道：“呼儿音落松萝雾，煮茗香传石径风。才入白云山下路，已参庵内老师翁。”欲参悟赵州“吃茶去”之旨。涵虚和尚在祭文中则写道：“一杯茶出自一片心，一片心即在一杯茶。”

丁以寿先生认为禅茶之名始于近年，而茶禅观念肇始于中唐，茶禅之名定于清。对于禅茶的概念，兼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禅茶研究中心主任的杭州灵隐寺方丈释光泉认为，禅茶是僧人在寺院借以传递禅定内涵与境界的茶，应该包括三个要点：生产环境出自寺院，生产主体应是僧侣，目的是传达禅定的内涵与境界，三者缺其一就难以称其为禅茶。

七、一碗茶中的和平

在历史演变中，我国逐步形成了四大茶道：宫廷茶道、雅士茶道、世俗茶道与禅门茶道。这四种茶道中，禅门茶道不含功利性和娱乐性，主张的是“悟禅”；世俗茶道功利性则重一些，玩名茶，求名壶，藏名家，以图用他人之名抬升自家身价。雅士茶道讲究的是“雅玩”，注重娱乐性，使茶艺成为一门艺术、一种文化；宫廷茶道除注重娱乐性之外，还讲究“奢华”，借以炫耀权力和富有。

宫廷茶道追逐奢靡，雅士茶道附庸风雅，禅门茶道推崇侘寂，世俗茶道随意任性。在几千年的茶文化中，追逐茶道中的奢靡之风如同一个弹簧，只要社会一安定，民众一富足，就会出现明显反弹，以为奢靡就是风雅，奢华就是品位，而要坚守禅门茶道的侘寂，有时则会显得不合时宜。

不同的人群，对于茶道的诉求大相径庭，当人们接近茶道之时，首先应把自己进行归类，自己偏爱与接受哪一类别的茶道？宫廷茶道已经离我们远去，只可远望，不宜近观。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企图接近与标榜自己热衷宫廷茶道的人，要么是傻子，要不就是骗子。雅士茶道在当下有着较大的市场，富裕起来的人们总想找回一些文艺青年的情怀，人们争相模仿、学习和创新着不同的茶道玩法，也定下了不少程式与规则，但是任何没有流派传承的努力都只能昙花一现。百姓茶道依然会大行其道，人们越来越离不开茶，虽然不去茶馆，但在办公桌上总有清茶一杯，即使是在饭桌上也有更多人喜欢以茶代酒，不守规矩约束的百姓茶道，不必去评论雅士茶道与禅艺门茶道的繁文缛节，吃自己的茶，让别人去玩吧！禅门茶道看着云起云落的纷争，



坚守着清净的精神高地，它将一如既往地引领茶道走在时代的最前列、走向最高处。

日本茶圣千利休的孙子千宗旦，曾经向另一位著名茶人小堀远州忠告说：“最近茶道流于华丽，能否控制一下华丽之风，尽量让利休居士的茶道得以复归？”没有想到，小堀远州辩解道：“贯彻‘侘’精神确实是茶道之核心思想，对此我也明白，但世间之茶道日趋奢华，以此我也束手无策。”说完之后又送给千宗旦一个银制茶勺，千宗旦马上在茶勺套筒上写了“水屋用”三个字，表示绝不在茶室上使用。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千宗旦是一个有骨气的茶人，不愿意随波逐流，始终坚守着“侘”的精神。

与世俗茶道追求功利性的出发点不同，禅门茶道总能在更高的精神领域寻找到灵魂的支点。它可能是美学的，抑或是哲学的指向；也可能来自信仰的，甚至是宗教的救赎。今天的日本茶道流派，把茶道四谛“和敬清寂”中的“和”境赋予现代化的情调，以“和”比附“和平”，日本里千家茶道甚至直称茶道是“一碗茶中的和平”艺术。

八、不完美而令人“怜惜”

这本《禅艺茶道》，是基于禅门茶道的核心思想，融合了部分雅士茶道的追求，特别是皈依佛门的居士起居生活状况而编著的一本茶道专著，它仅仅截取了茶道丰富体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在《禅艺茶道》一书中并不能涵盖茶道的所有内容，但在搜集与描述禅门茶道方面做了更多的聚焦。

对于禅艺茶道本身而言，《禅艺茶道》可能是谈论禅与茶关系最丰

富的一本书，然而正因为它只是截取了整个茶道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面，却同样留下了不可弥补的遗憾，那就是它的不完整性和不完善性，正如茶道中的“侘”一样，因为不完美而令人“惋惜”与“怜惜”。

许多在茶道发展史中重要的历史事件与论述，因为与禅无关而被作者有意识“遗漏”掉了。即便是与禅有关的茶道内容，也因为编著者的学识有限，难免留下不足。为此，作为本书的编著者，诚恳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到禅宗美学与禅艺茶道的研究与讨论之中，以促进事物从不完整到完整、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完美到完美的转化，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禅艺茶道》的出版价值就会得到更多提升。对于《禅艺茶道》中出现的不当之处，还望读者朋友不吝指正。

在《禅艺茶道》一书的编著过程中，获得了一批认识与不认识茶友的热情支持，为编著者提供了许多茶山实地考证的便利，以及文献查询的线索。在研究陆羽及其《茶经》学术领域卓有成就的湖州著名茶人大茶老师，更是为本书的部分内容进行了重新考证与勘误，一些看似小小的指正，往往凝聚着指出者多年茶学研究的深厚积累与治学态度。因此，我把每一次的写作与出版过程，都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学期，这种专注于一事的学习，通常是高效达成目标和有效开启智慧的愉悦历程。

作为编著完成的专著，在写作中一定吸收与运用了大量前人的研究与探索成果，有的成果已经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为了表示对原作者的感谢，在文后的参考文献中已经尽可能详尽地列出；有的则可能在讲座、沙龙、网络、视频中获得信息，因无法确切了解各个观点与成果的最先提出者，未能有机会列在参考文献之中，在此要特别感谢这些贡献了知识与智慧的学长、导师和茶人，大家共同的探索将是中



国茶道未来发展的真正希望所在。

本书的出版也获得了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迟志刚先生、上海油画雕塑院金焰先生，以及文汇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蔡沪建先生更为本书的设计与美化做了许多努力，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纯道

二零一七年春节

于太湖禅艺舍